

從澳門學研究書目的編製看 澳門學的發展

葉 農

[摘 要] 自20世紀90年代，學術界提出了構建澳門學的倡議以來，經過學術界學者們的共同努力，通過對其學理的探討、對其內涵與外延的分析、對研究領域與研究對象的界定、對研究史料的發掘與整理，澳門學的學理越來越清晰，其特色與價值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，研究隊伍不斷擴大，研究成果層出不窮，專門的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定期召開。澳門學已經成為一門顯學矣！如何推動澳門學的研究走向深入，是擺在學術界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。本文研究了三個問題：一、澳門學研究的學理化；二、澳門學研究與目錄學之關係；三、編製“澳門學研究著作提要”之學術價值與意義。

[關鍵詞] 澳門學 書目編製 目錄學

一、澳門學：新興的學術研究領域

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期，隨着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的聯合聲明的簽署，以及澳門進入到回歸過渡期，澳門問題的研究又掀起了一個新高潮。大批學者加入研究隊伍，大量的原始史料得到了整理出版，澳門的政治、主權、社會、經濟、文化交流、宗教、教育、城市等諸多方面得到了廣泛深入的研究，這些研究成果難以盡舉，還形成一些有關澳門問題的國內外研究重鎮，提出了創設澳門學。

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，以陳樹榮、黃漢強、楊允中為代表的一批澳門學者首先提出建立澳門學的構想，並進行了多次深入的探討。^①黃漢強認為，提倡澳門學是因為澳門四百多年來，沉積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豐富文化的基因，形成今天獨特的澳門文化模式，而這種文化模式對20世紀的人類社會有獨特的意義。澳門學的研究對象應是澳門文化，研究方法是唯物辯證思維主導的靜態分析、動態分析、結構分析和綜合分析。^②1994年，常紹溫又對此問題進行了論

作者簡介：葉農，暨南大學港澳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。廣州 510632

① 吳志良：《舊話重提“澳門學”》，《東西交匯看澳門》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1996年，第37—42頁。

② 黃漢強：《關於〈澳門學〉對象與方法的思考》，《學術研究》（廣州）2001年第7期。

述。^①湯開建较好地論述了澳門學的概念，並認為澳門學創設的兩個“量”已經達到了要求：澳門學研究的內涵量、研究隊伍的數量與品質。^②而吳志良則認為澳門學的葡萄牙語名稱，除了Macaologia之外，也可採用Estudos Macaenese或Estudos de Macau這兩種譯法，並指出澳門學研究的內容應該有：澳門起源、澳門宗教及中國傳教史、澳門港口都市發展、中西文化交流、澳門海外貿易及其在中國總體海外貿易中的地位與作用、原住民、民族融合及族群關係、以澳門為中心的華人移民史、涉外關係、海洋思想文化、文學史、語言史、世界澳門學資源普查、其他方面等。^③

近年來，澳門大學、澳門基金會等機構先後召開了四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。2010年4月15—16日，為了推動澳門學研究，並將澳門學推向國際主流學術界，由澳門大學、澳門基金會、澳門歐洲研究學會主辦、澳門社會科學學會、澳門學者同盟合辦的“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”在澳門召開。它主要討論了下列論題：1、澳門與澳門學；2、澳門學的學科特徵與學科體系；3、全球視野與國際關係中的澳門；4、澳門文獻整理與史料發現；5、澳門歷史與文化；6、澳門宗教與社會。學者們認為：澳門學研究是圍繞着頗具特色、影響很大的澳門文化展開的，研究澳門的“互動相生”的文明形態，為澳門學研究提供了主要理論框架和學術範式。它可以概括為是一門以文獻檔案、文化遺產為基礎，以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活為對象，探尋澳門模式與澳門精神及其效應的綜合性學科。為了將澳門學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，學者們認為澳門學必須具備下列特徵：一是系統性與科學性，學科理論的系統性是一門學術的基礎，沒有系統性，就沒有科學性；二是具有國際性影響。

2011年10月19—20日，由澳門大學、澳門基金會、里斯本科技大學社會及政治學院東方研究所聯合主辦的“第二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”在葡萄牙里斯本科技大學舉行。三十多位來自中國內地、澳門、葡萄牙、美國、比利時、巴西、意大利等國家及地區的專家學者，圍繞“澳門學文獻調查與研究”主題展開深入研討，對澳門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提出了建設性意見。會上共發表23篇論文，涵蓋主題包括：葡萄牙及歐洲等國目前館藏的澳門相關文獻資料情況、澳門相關史料的挖掘及研究進展、構建澳門學的意義價值、澳門文獻學研究情況等。

2012年11月15—16日，由澳門大學、澳門基金會、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、北京外國語大學聯合主辦“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”於在北京舉辦，會議主題定為“全球視野下的知識建構與學術生長——以澳門學為個案”。與會的四十餘位學者就“澳門學的理論構建”、“澳門與近代全球化”、“澳門本土史研究”展開了研討。從澳門學的理論構建來看，高翔認為澳門學發展應該建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，需要超越澳門問題本身，將澳門問題放置在整個人類歷史進程中予以考察，以人文關懷理論的自覺性揭示出澳門問題的普遍性意義。吳志良指出澳門學的核心任務是：因澳門曾經成功扮演中西文化交流平台角色，為人類文明相遇與對話提供了“公共空間”，同時澳門兼備多重社會身份認同，從而方便並增進了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對話和理解，因此，必須重視澳門學的學科建設。而今後更需要繼續以下工作：確定學術的具體內容和技術操作，探

① 常紹溫：《從澳門歷史文化的特點略談建立“澳門學”問題》，《文化雜誌》（澳門）1994年總第19期，第168—169頁。

② 湯開建：《“澳門學”芻議》，《特區與港澳經濟》（廣州）1995年第2期。

③ 金國平、吳志良：《澳門歷史研究述評》，《東西望洋》，澳門：澳門成人教育學會，2002年，第15—16頁。

索“澳門模式”的宏觀特徵和微觀內容。郝雨凡認為研究澳門學必須“跳出澳門研究澳門”，從全球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視野考察澳門歷史及社會、文化、經濟的獨特的結構功能和價值形態，以“互動相生”的範式探討澳門在世界文明進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，以彌補世界史關於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研究的不足，豐富人類現有的知識體系。澳門學的知識譜系特點，決定了澳門學的學術內涵既有歷史的文獻性，又有當代的現實性。^①

2015年6月23—26日，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、澳門基金會及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，又在澳門大學舉辦“第四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”。此次研討會的主題為“學科建設與文獻基礎”，力圖以新觀點、新材料、新成果推動澳門學學科建設及澳門學相關領域的研究。

許多學者就澳門學範式意義等問題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。郝雨凡、林廣志認為：澳門文化是異質異體文明碰撞相融的獨特案例。澳門學作為研究澳門的學問，通過豐富而鮮活的歷史文獻、文化遺存以及現實生活，以“互動相生”的文化傳播形態，揭示澳門文化的核心價值，並以此豐富世界文明史關於“跨文化互動”的研究範式，可以為人類知識體系提供增量。同時，澳門的實踐和經驗，可以為不同民族、文化、宗教的和諧相處提供有益的啓示和借鑑。澳門學所從事的就是在大量文獻以及現實生活研究的基礎上，尋找澳門的歷史文化價值，並探討這種價值與人類知識體系、價值體系和人類文明發展的關係。同時，揭示澳門多元文化互動相生的奧秘，以此建設澳門的價值體系和符號體系，發掘和發揚獨特的、具有生命力的“澳門模式”、“澳門精神”，為推進“一國兩制”國策的貫徹實施，為澳門經濟社會的繁榮穩定，為不同民族、宗教、文化提供和諧共處的價值樣本，為人類的和諧進步作出貢獻。^②

二、澳門學研究與目錄學

澳門學研究，雖然在學理、範式等方面取得了相當多的成果，但澳門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，目錄學不可或缺。目錄學是研究目錄工作形成和發展的一般規律（即研究書目情報運動規律）的科學。我國古代很早就有人注意到目錄學的作用，西漢時，劉向、劉歆父子就撰有《別錄》、《七略》等目錄學著作，以後歷朝均有專著。南宋鄭樵有《通志·校讎略》，至清代，章學誠著《校讎通義》，更總結了目錄學的豐富經驗，而反映我國古代著述的規模最大、最全的目錄是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和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。^③

目錄學對於學術研究的重要價值在其“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”。章學誠指出：“校讎之義，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，將以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，非深明於道術精微、群言得失之故者，不足與此。後世部次甲乙、紀錄經史者，代有其人，而求能推闡大義、條別學術異同、使人由委溯源、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，千百之中不十一焉。”^④

① 楊大衛：《澳門學：知識建構與學術成長——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》，《澳門研究》（澳門）2012年總第4期，第176頁。

② 郝雨凡、林廣志：《澳門學：互動相生的文化“活化石”》，《社會科學報》（上海）2010年5月27日；林廣志：《試論澳門學的概念、對象及其方法》，《廣東社會科學》（廣州）2010年第6期，第92—99頁。

③ 徐有富：《目錄學與學術史》“導言”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，第1—2頁。

④ [清]章學誠：《校讎通義通解》，王重民通解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頁。

余嘉錫亦指出：“目錄者學術之史也……綜其體例，大要有三：一曰篇目，所以考一書之源流；二曰敘錄，所以考一人之源流；三曰小序，所以考一家之源流。三者亦相為出入，要之皆辨章學術也。”^①

目錄學如何做到“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”？目錄學與學術史之間有何密切關係？書目具有哪些學術史價值？首先，通過目錄的分類，可以說明學術源流。《四庫全書總目·凡例》指出：“文章流別，歷代增新，古來有是一家，即應立是一類。”其次，書目之序（包括全目之序、大類之序、小類之序及按語）的利用，均有“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”之功能。第三，書目的著錄情況，如書名項、著者項、稽核項、版本項、提要項、附注項和一些統計數據，可以幫助學術界瞭解一個斷代等的文獻發展情況。如《清史稿·藝文志》著作目錄138部，《清史稿藝文志補編》著作目錄96部，《清史稿藝文志拾遺》著作目錄761部，三者合計著錄清代目錄955部，由此可見有清一代，目錄學為顯學矣。

澳門學研究與目錄學有何關係？編製“澳門學研究著作總書目”，就是利用目錄學的研究方法，來促進澳門學研究的深入發展。

三、“澳門學研究著作總書目”編製的學術價值與意義

編製與澳門學研究有關的書目，是澳門學研究過程中所形成的一個顯著的學術傳統與做法。許多學者因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的需要，編製過關於澳門問題研究的書目。據澳門大學圖書館王國強先生統計，從1583—2004年間，出版過的相關書目有208種：綜合書目11種、專題書目41種、展覽書目42種、出版目錄11種、藏書目錄62種、期刊索引5種，此外，網頁之報刊索引、書目、圖書館書目共有36種（表1）。^②

表1 《澳門參考工具書書目》收錄情況表

編號	類別	數量	編號	類別	數量
1	統計資料	235	2	字典、辭典及百科全書	101
3	年鑑、年表及年報	225	4	圖錄及名錄	137
5	手冊及指南	158	6	地理資料	443
7	傳記資料	64	8	分類表	10
9	書目及索引	208	10	資料庫及檢索引擎	35
共計	5	990	共計	5	726
總計	1,616種				

資料來源：王國強編著：《澳門參考工具書書目》“凡例”，澳門：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，2005年。

當中，較為重要的有高美士（Luís Gonzaga Gomes）所編製的《澳門書目》（*Bibliografia Macaense*，1987年由澳門文化司署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再版，共202頁）、葡萄牙學者羅

① 余嘉錫：《目錄學發微·古書通例》卷二“目錄書體制一：篇目”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25頁。

② 王國強編著：《澳門參考工具書書目》，澳門：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，2005年，第103頁。

理路（Rui Manuel Loureiro）教授出版的指南性書目《澳門歷史指南（1500—1900）》（*Guia de História de Macau 1500—1900*，1999年由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Comissão Territorial de Macau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ientos Portugueses在澳門出版，中文版由陳用儀翻譯，同時出版）。此外，還有Isaú Santos編輯的*Macau e O Oriente no Arquivo Histórico Ultramarino*（1997年由澳門文化司署出版）；劉芳編輯的《漢文文書：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收藏澳門及東方檔案文獻》（1997年由澳門文化司署出版）；若澤·加華列路（Jorge Cavalheiro）等著、柯天蓮譯的《澳門歷史文化指南》（*Guia Historico-cultural de Macau*，1999年由Instituto de Estudos Europeus de Macau出版）；文兆堅編著的《澳門研究書目提要》（2014年由澳門理工學院出版）；等等。

綜上所述，“澳門學研究著作總書目”的編製，應該本着“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”的原則，遵循下列原則：

（一）做好澳門學研究的分期工作

關於澳門學研究工作的分期，羅理路教授提出了其分期原則：根據葡萄牙人東來亞洲與澳門歷史發展兩條線索進行分期。因此，他將葡萄牙人東來分成了九個部分：1）作為起點的葡萄牙；2）運動中的歐洲；3）葡萄牙的發現事業與擴張；4）亞洲概貌；5）中國歷史與文化；6）歐洲與中國的互動關係；7）葡萄牙在亞洲；8）葡萄牙在遠東；9）葡萄牙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。它也將澳門歷史分成了七個部分：1）概貌／16—19世紀；2）大題目／16—19世紀；3）初期的葡中接觸／1500—1550；4）澳門的起源／1550—1560；5）成長與鞏固／1560—1640；6）危機與恢復時期／1640—1800；7）19世紀的澳門／1800—1900。

澳門大學湯開建教授認為，澳門學研究的第一時期為18世紀中葉澳門學的起源；第二時期為19世紀上半葉至20世紀初，葡萄牙學者對澳門學的關注；第三時期為20世紀上半葉至20世紀80年代前國際澳門學研究。第四時期為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的澳門學研究，澳門學發展的全盛時期。第五時期為2000—2010年回歸十年，是澳門學發展的最為重要的階段。

筆者認為，澳門學發展的分期，可以根據中國明清歷史發展的軌跡來進行並分為下列階段：1）明朝中後期（1540—1644）；2）清朝中前期（1645—1842）；3）清朝晚期（1843—1911）；4）民國時期（1912—1949）；5）20世紀下半葉：上（1950—1989）；6）20世紀下半葉：下（澳門過渡期1988—1999）。

（二）澳門學研究成果的分類工作

目錄學“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”，主要體現在成果的分類工作之中。據筆者的收集整理，目前收藏在世界各大主要圖書館中的澳門學研究成果，超過了4,000種。將它們合理分類，就是總結過去澳門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之過程。通過對其分類，可以反映出澳門學研究工作的發展歷程。

（三）撰寫大小序

撰寫總序與各類的分序，亦是重要的學術工作。以清代永瑤、紀昀主編的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為例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簡稱《總目》、《四庫總目》、《四庫提要》，共二百卷，是中國清代編纂的一部大型解題書目，是中國古典目錄學方法的集大成者。《總目》以經、史、子、集提綱，部下分類，全書共分四部、四十四類、六十七個子目，錄收《四庫全書》的著作3,461種、79,307卷，又附錄了未收入《四庫全書》的著作6,793種、93,551卷。各書之下編有內容提要，“先列作者之爵里，以論世知人；次考本書之得失，權衆說之異同；以及文字增刪、篇帙分

合，皆詳為定辨，巨細不遺；而人品學術之醇疵，國紀朝章之法戒，亦未嘗不各昭彰瘴，用著懲戒”。^①詳為考辨。禮親王代善之後昭槿評價道：“所著《四庫全書總要》總匯三千年間典籍，持論簡而明，修辭淡而雅，人爭服之。”^②江藩撰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稱：“大而經史子集，以及醫卜詞曲之類，評論抉奧闡幽，詞明理正，識力在王仲寶、阮孝緒之上，可謂通儒矣。”^③《總目》完成後，在清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年）由武英殿刊印，是為殿本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年）杭州官府根據文瀾閣所藏殿本重刻，是為浙本。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，廣東又以浙本為底本翻刻，是為粵本。三刻本中，以殿本最佳，以浙本流傳最廣。對《總目》的辨析考證研究，主要有胡玉縉撰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》、余嘉錫撰《四庫提要辨證》、崔富章撰《四庫提要補正》和李裕民撰《四庫提要訂誤》。1997年，中華書局以殿本為底本，以浙、粵二本為參考本，吸取各家考證研究成果，出版的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》是目前最佳的版本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編撰與流傳，為我們編制《澳門學研究著作書目》提供了很好的借鑑與範示。

[責任編輯 陳超敏]

① [清]永瑤等撰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“凡例”，第17—18頁。

② [清]周中孚撰《鄭堂讀書記》卷三十二《史部》十八，民國十年（1921年）刻吳興叢書本，轉引自“中國基本古籍庫”。

③ [清]江藩：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，第93頁。